

破解职场歧视,促进平等就业 4

共享经济平台用工模式下,一些歧视手段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

算法之下,如何寻求公平就业机会

阅读提示

近年来,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算法不合理应用导致的问题备受... 为了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有针对性的管理规定...

以察觉,劳动者对此难以获知、难以证实,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性别歧视给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带来的新挑战。

警惕求职中的“黑箱”淘汰

“女性有更多轻松一点的职业选择,不适合这风吹日晒雨淋的粗活”。成都市一街道男性快递员站点近百名从业者中98%为男性,作为主力队伍中的一员,赵明认为团队中女性稀少,缘于行业特殊性,女性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对此叶莉并不认同。

“只要挣钱多,谁还怕吃苦呢!”叶莉学历不高,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寻一份合心意的工作并不容易,外卖送餐时间灵活、薪水可观,于她而言十分珍惜。但即便在人员紧缺的年末,仍险些与这份工作失之交臂,“无外乎担心女性身子柔弱,体力活坚持不下来”。

赵明和叶莉各持己见,任谁也没有想过平台运转的背后,掌控大数据排列组合的算法正在影响他们的求职就业。

近年来,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算法不合理应用导致的问题备受... 为了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有针对性的管理规定...

在共享经济平台用工模式下,叶莉对其获取工作机会的艰难无限多想。但这一潜在问题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在数字时代,随着算法参与用工管理过程,就业歧视手段更隐蔽、损害更难

觉的歧视结果。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在专注于劳动法学的研究中敏锐察觉到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与传统算法不同,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当代算法自主获取信息能力极大提升,不仅会在自学中不断变化,其内容也可能无法被程序员、更无法被公众理解,成为某种意义上“黑箱”,并可能嵌入设计者和雇主固有的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固有的性别不平等。

算法歧视更隐秘且难以规制

“共享经济下,弹性的工作时间、灵活的就业方式对女性有着天然吸引力,曾被认为能够促进两性就业平等、赋权女性经济能力,现实并非如此”。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张凌寒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虽然总体来说共享经济为社会创造了更多劳动和收入机会,但却更多地分配给了男性劳动者。

“这也意味着我们针对性别歧视的法律防御体系存在失灵的风险。”阎天告诉记者,由于算法可以从数据中准确推测求职者婚育状况等信息,其自主性也让性别因素在算法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难以确定。

因此,我国现有法律对反就业歧视中关于性别歧视的规定,不足以应对算法歧视可能产生的情形。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性别歧视的规定均是针对直接性别歧视,如阻止获知求职者婚育状况、禁止将性

别因素纳入人事决策等,但数字时代的隐性性别歧视很难通过主观意图得到证明。

现行劳动保障法律制度受到挑战

面对算法歧视对于女性公平就业的挑战,学界前瞻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其中部分获得政府初步采纳。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将求职者婚育信息确定为“敏感个人信息”,用人单位在处理这类信息时必须“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以及禁止算法获取某些便于推测女性婚育状况的数据等。但绝大多数被认为是治标之策,非治本之道。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张凌寒认为,应该对传统法律制度作出扩大解释,便于女性劳动者在算法自动化决策做出不利的人事决策时,寻求主动性性别歧视的救济;将算法纳入劳动法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范围,便于法院审查用人单位利用算法参与用工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扩大对性别歧视的结果认定,将间接性别歧视纳入劳动法规制对象中。

“针对算法在就业歧视中所起作用的讨论属于‘治未病’范畴,其背后的发病机理更应得到关注”。阎天称,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三孩”背景下,就业歧视的“病根”在于生育成本分担的不公。随着其与算法歧视之间的因果联系愈发突显,如何消除“病根”,更为值得深思。

G 说案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个案微观

骑手工作时不能拒绝接单 受伤后却没了单位

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用工管理、劳动报酬支付等是关键因素

本报记者 李国

近年来,随着外卖市场的火热,外卖骑手的队伍不断壮大,用工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或规避风险,往往不和外卖员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发生事故后难以获得工伤待遇。

【案情介绍】

重庆某商贸公司是一家外卖平台合作方,主要负责该平台在渝北片区的营销运营和骑手管理工作。

陈某于2020年5月1日,通过扫描商贸公司指定的二维码成为该平台骑手,负责外卖配送。商贸公司为陈某购买了雇主责任险基础版商业保险,保单载明雇员为陈某,工作性质为全职。陈某与商贸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签订任何其他书面协议。

当年10月,陈某因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住院治疗,要求商贸公司确认工伤待遇未果,遂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庭审过程】

在仲裁庭审理过程中,陈某称,商贸公司要求他下载该平台App作为软件工具,进行账号注册登录、上线、下线、外卖接单和劳动报酬领取等工作程序。

商贸公司向陈某提供带有该平台标志的服装、头盔、保温箱等装备,并要求其工作时间穿戴。陈某自备交通工具摩托车用于外卖配送。商贸公司对配送员每天进行早、中、晚排班,并由该公司考勤人员记录考勤。

商贸公司要求陈某严格执行考勤时间和考核奖惩规定,有事需要向组长或站长请假,不能拒绝接单,接到平台派单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派送。送单报酬根据派单数量实行阶梯计价。

商贸公司向陈某支付的报酬由送单报酬、全勤奖、工龄奖和油费补贴构成,于次月23日通过平台绑定的支付软件向陈某支付。商贸公司从包括陈某在内的骑手劳动中获取利润。

陈某认为自其上班第一天起,就与商贸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所以请求仲裁庭确认他与商贸公司自2020年5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从而认定其工伤。

商贸公司则称,陈某2020年10月13日因上线时间晚20分钟,被平台显示为账号考勤结果异常。后才知其因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住院治疗。因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合作协议,公司无法确认其劳动关系,也就无法按照工伤处理。

【审判结果】

重庆仲裁委员会认为,陈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要求以及考勤考核等方面都受到商贸公司及其指定的平台App的管理与约束,商贸公司从陈某的劳动成果中取得收益。故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陈某与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中受到的人身伤害自然是工伤。

【以案说法】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关于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审理实践中需从招聘录用经过、实际用工主体与过程、工作职责与内容、劳动报酬的支付、用工及劳动风险承担、用工管理、绩效考核等经济从属性、人身从属性方面综合判断。

调查显示,超四成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压力增大,超六成人认为远程办公时长被延长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好消息是朝九晚五的界限被打破,坏消息是朝九晚五的界限被打破”。“远程办公比在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更长也更累,工作效率也低”……记者近日采访发现,疫情之下,远程办公正成为职场人避不开的工作模式,但不少人的体验并不好。数据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表示远程办公下的日均工作时长不同程度的“被延长”。

前程无忧于4月25日发布的《远程办公人群获得感调查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65.8%的受访者表示远程办公下的日均工作时长不同程度的“被延长”;分别有40.1%、45.0%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增加了工作压力、降低了工作效率。

“家里的工作效率远没有在公司效率高。很多时候在公司面对面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换成线上,效率就很低,并且因为疫情远程办公会出现很多干扰因素,比如临时被要求做核酸(排队还很长)等。”深圳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职工刘女士对记者说。

专家指出,远程办公相比于传统的集中式办公,具有运营成本更低、数字化办公程度更高等方面优势。但就现阶段来看,远程办公还是会给企业和员工的生产效率带来部分负面影响。如何消除远程办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如何保障远程办公员工的薪酬福利,如何避免职场人远程办公时间过长等,将成为企业需解决的议题。



北京警方查获一起利用社交平台销售假冒“冰墩墩”玩偶案

4月26日第22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今年以来首都警方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90余起,尤其是打击了一批涉冬奥知识产权案件。图为警方现场查获一起利用社交平台售卖假冒“冰墩墩”玩偶案件中上游供货商房里的假冒“冰墩墩”。张敬昕摄

面对穷凶极恶的对象、随时被犯罪嫌疑人传染病毒的危险,苏玉平不惧怕、不退缩、不回避

20年磨一剑的禁毒战士

本报记者 周倩

苏玉平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一名一线禁毒警,1999年从事禁毒工作至今,他坚守在禁毒第一线,以强烈的责任意识、严谨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专业知识、无畏的担当精神,铸造了一柄“禁毒利刃”。

生死线上的较量

作为一名禁毒警察,不仅需要吃苦耐劳的品德,更要有不畏生死的勇气。2016年,苏玉平从福建开车跟踪犯罪嫌疑人到包头,在高速公路上抓捕时,嫌疑人突然开车冲撞并向他开枪。苏玉平果断回击,成功制服犯罪嫌疑人,现场缴获手枪一支,子弹14发,毒品冰毒7000余克,后又深挖上线缴获毒品8000克,各类枪支5支,子弹47发,手雷一枚。

还有一次,苏玉平在黄河河段的一座大桥上发现一辆可疑车辆。经搜查,从车上桶装方便面、黑芝麻糊袋、毛绒玩具中发现3231.5克海洛因。在零口供情况下他远赴四川、云南等地工作70余日,辗转奔波,连续作

战,最终缴获海洛因5300多克,毒资219万元,抓获嫌疑人员35名,其中5名被判处死刑。

对于一名禁毒警来说,顾不上个人安危是常有的事。2019年8月,苏玉平带队侦办一起案件,在湖北连续工作30多天抓捕犯罪分子6名,抓捕其中一名犯罪分子时,正值凌晨一点钟,他独自一人正欲逃跑的毒贩迎面相遇,他毫不犹豫冲上去,毒贩叫来其喂养的两条猎犬。面对歹徒恶犬,他没有放弃抓捕,在搏斗中他的腿被狗咬了个大血窟窿,但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毒贩,直至队友赶来将其制服。此时他腿上鲜血直流,本应该去医院,但他为固定证据,整整一夜未休息,冒着感染狂犬病危险,第二天才去治疗。

斗智斗勇坚守底线

苏玉平爱琢磨,从案情分析到指挥协调,从跟踪蹲守到抓捕归案,从调查取证到审讯,苏玉平说“办案就是需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他与破获案件3500多起,打击犯罪嫌疑人4100多人,破获公安部目标案件12起,公安厅目标案件15起,缴获各类毒品3.7吨、

枪支16支,追缴毒资1000余万元。他带领团队创造了多个纪录:破获全市第一起千克以上贩毒案,第一起跨省贩毒案,第一起公安部目标案件,第一起物流贩毒案;破获内蒙古最大的贩卖海洛因案;在全区首次对艾滋病病人贩毒、怀孕和带小孩妇女贩毒进行全面严厉打击,拉开了内蒙古与凉山治理贩毒合作的帷幕;破获了内蒙古第一起航空贩毒案,一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一案缴获毒资最多、一案判处死刑最多的案件。苏玉平的多项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

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许多毒贩企图用重金收买。2018年,他破获一起系列特大贩毒案,主犯张某托人向他求情,希望用30万元来减轻法律的制裁,他严词拒绝并劝张某自首,张某深受触动,不仅自首,还一并上交有犯罪所得56万元的银行卡也一并上交。

苏玉平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集体二等功3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缉毒侦查能手等30多项荣誉。2017年被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2020年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始终不渝的禁毒决心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治安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春节一过,苏玉平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承担起单位和居住小区的值班防控工作,抓捕办案与防疫两不误,还悄悄捐了3100元用于疫情防控。苏玉平心中始终装着群众,20年来他累计捐款3万余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深入群众尽心尽力帮助4户居民脱贫。

他经常加班熬夜、超负荷工作,几天甚至几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因长期劳累,被确诊为冠心病和高血压,长期服药,但他依旧忘我工作,曾因蹲守嫌疑人连续两晚没有休息,晕倒在现场。

他面对的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抓捕时常遇到枪口对准他、刀刀刺向他、开车撞向他……他没有惧怕;他抓捕艾滋病患者60余名,其他患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犯罪嫌疑人390多名,面对被传染的风险,他没有回避;多名吸贩毒人员用割腕、剖腹、跳楼等方式施压,以逃避打击,他没有退缩;毒贩扬言要报复他和家人,但苏玉平禁毒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畅通困难群体依法救助通道

本报讯 山东省冠县甘官屯镇张八寨村的小丽姐妹俩品学兼优,但却遇到家庭不幸。去年秋,她们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长期在外务工联系不上。镇司法所工作人员、驻村律师及管区、帮扶责任人等了解其情况,商议变更姐妹俩的监护权,并实施困境儿童救助。但因为其母亲长时间无音讯,且和其父未办理离婚手续,变更监护人须由法院判决。

为此,当地司法所向法院提出申请,实行缺席判决,依法将监护权转移给其伯父。民政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小丽姐妹俩每人每月能享受1694元救助。这是该县实施法治扶贫的一个典型案例。

为推进法治扶贫,该县充分发挥县镇各级党组织、司法部门及帮扶责任人的作用,全力推进法治建设。据了解,2021年以来,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始以来,18个乡镇街道共计开展进村、学校、企业、社区、集贸市场等多形式的法治宣传150次,印发法治扶贫宣传材料27万张,为留守老人、妇女、困境儿童、脱贫户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近百次,协调有关家庭、婚姻、土地、宅基地纠纷700余起,为36名农民工追回欠款98万元,推进了平安建设和乡村振兴。

(于冬梅)